

中国革命 与苏联顾问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

(1920—1935年)

M·C·贾比才等著

张 静 译

李捷男 王福曾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

(1920—1935)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吉庆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 1/2印张 119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500册

统一书号: 11190·063 定价: 0.45元

(限国内发行)

中国革命とソ連の顧問たさ

訳者 毛里和子
本荘比佐子

発行者 高橋通敏

発行所 財団法人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昭和52年3月31日 初版発行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译 者 的 话

这本书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单位编写，东方文献出版社1970年出版的，原名《参加过中国革命的著名苏联共产党员》，后经日本国际研究所的毛里和子和东洋文库的本庄比佐子译成日文，书名改为《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现在的译文是从日译本译出的。书中介绍了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与中国革命有密切关系、超过重要影响的六个苏联活动家，他们是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加拉罕，孙中山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首席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加伦），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以及苏联东方问题专家马季亚尔。日译本加了大量的注释，并写了译后记。这些注释和译后记，或者提供了新资料，或者说明了原书未说清楚的问题，或者对原作者的某些说法进行了评论，或者纠正了原作者的某些不正确的论断，篇幅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由于这种原因，这本书的翻译采用了日译本（校订时参看了俄文本）。

中国革命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了解这种关系，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时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曾向中国派遣了大批顾问，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他们的活动而产生的。这本书介绍了这六个苏联活动家的生平事迹，主要是讲了他们有关中国革命的思想

想、理论、著作，以及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所参加的活动和所起的作用，书中还引用了一些未曾公开发表的材料。书中介绍和引用的这些材料对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本书的作者对人物介绍带有明显的宣传目的，这就是夸大这些活动家对中国革命的作用，而对他们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则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有些地方还歪曲事实。这些，读者都不难发现，不难判断。例如：书中提到马季亚尔与米夫、库丘莫夫等人共同准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时说：“信中广泛引用了马季亚尔和库丘莫夫提出的论点和方针，并且建议中共中央‘以农民起义来包围城市’。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证明了这个建议的深远意义。”日译者在注释中指出：这封信“指示依靠发动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通过农民暴动去包围城市。但是，这只是最后在工业中心的大城市发动暴动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城市暴动的路线是‘信’的基本思想。因此陈绍禹等人在取代李立三和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组成新领导机构以后，在城市中心的革命路线这一点上与李立三没有什么不同。”这类情况，书中还有一些。不过尽管有这类问题，这本书连同它的日译者注释和译后记，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可资参考的资料。

本书的注释有三种：原注、日译者注和中译者注。原注和中译者注数量较小，都用脚注。原注用（注1）（注2）……标明，中译者注用※号标明。日译者注数量大，一律放在全书之后，用（1）（2）……标明。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宗绍柏同志的帮助，谨此致谢。

译者

一九八〇年六月

目 录

列夫·加拉罕

——第一任驻华大使…………… M·C·贾比才 (1)

米哈依尔·鲍罗廷

——支配广东的人…………… P·A·米罗维茨卡娅 (18)

瓦西里·布留赫尔 (加伦)

——指挥北伐作战的人…………… A·И·卡尔图诺娃 (37)

维经斯基

——赴上海的秘使…………… B·И·格鲁宁 (61)

巴威尔·米夫

——苏维埃革命战略的筹划者

…………… A·M·格里高里叶夫 (84)

柳德维格·马季亚尔

——年轻的东方学者…………… A·M·格里高里叶夫、

B·H·基尼福洛夫…………… (99)

日译本注释…………… (109)

中国国民革命与苏联 (代译者后记) ……毛里和子 (125)

参考文献和著作目录…………… (151)

列夫·加拉罕（1889—1937年）

——第一任驻华大使

—M·C·贾比才—

列夫·米哈依洛维奇·加拉罕的名字是同建立苏中两国之间友好平等关系的斗争，同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加拉罕于1889年2月2日出生在第比利斯一个高加索知名律师米哈依尔·加拉哈年的家里。他曾在第比利斯第三中学上过学。1904年投身革命运动，参加了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散发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书刊。同年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秘密活动时期

具有进步和自由思想的加拉罕，因在第比利斯遭到迫害，于1905年随同亲属移居中国的哈尔滨，以后又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在新地方，列夫很快就与当地地下的社会民主党人取得了联系。他参与了建立出版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书刊印刷所的活动，还执行了其他一些任务。1910年哈尔滨警察将他逮捕，关进监狱。但是，警察搜查非法印刷所曾一度占用的公寓时，未发现加拉罕的任何罪证，一个月后只好把他释放了。

1910年秋，列夫到彼得堡考入一所大学的法律系，但是没有毕业。他又重新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地下组织，完成了他分担的许多工作。他的合法身份是首都报纸记者，用的笔名是“加拉罕”，从此这便成了他在党内的称呼。

加拉罕在1914年到1915年期间写了许多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里他一向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革命战争，以及建立第三国际。同时，他还组织了合法的国际杂志《新大地》的出版工作。

1915年9月1日加拉罕再次被捕。经过三个月的判决前羁押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在流放期间，他继续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地下组织的活动，并为贝加尔地方的社会主义报纸和杂志写了很多文章。他通过了托姆斯克大学的毕业考试。

二月革命后不久，加拉罕于1917年4月21日回到彼得格勒，6月他成为全俄第一届工兵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8月当选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与卢那察尔斯基、曼努伊尔斯基、~~乌利茨基~~、~~越飞~~、尤列涅夫等所属的社会民主党的区联派一起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十月革命时，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在列宁的领导下与其他同志一道，直接准备和组织了武装起义。

副外交人民委员

十月革命胜利后，加拉罕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赴布列斯特的苏联代表团，和德国及其盟国进行和平谈判，并且被任命为代表团秘书。在布列斯特谈判的复杂情

况下，他表现了惊人的耐力和顽强精神，以极大的忠诚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这次谈判成为加拉罕外交生涯的起点。

在批准对德和约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托洛茨基由于在谈判期间把年青的苏维埃俄国拖到了军事复灭的边缘而被解除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根据列宁的建议，任命契切林⁽¹⁾接替这个职务。1918年加拉罕被指定为副外交人民委员。

外交人民委员部当时还处于草创时期，面临着很多困难，缺乏懂行的工作人员和办公地点。加拉罕参与解决了许多问题，例如，遴选和配备干部，解决各种财务问题，负责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安全保卫处和外交文书等工作。初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期间，加拉罕有幸能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现在还保存着列宁给契切林和加拉罕的信件。列宁在这些信件中向他们提出建议，有时就各种问题代为拟定苏联政府外交文件的文稿。列宁还常常在给加拉罕的信中谈到个人问题。在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时，加拉罕经常与列宁单独接触，他学会了列宁的工作作风，从而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苏联外交官。以后党把他派到外交战线最重要的岗位上。契切林在给列宁的信中谈到加拉罕的工作情况时写道：“到现在为止，我们必须用绝对不足的力量和初建的不完善的机关来处理大量的政治和技术的工作。在发展同许多国家的关系中，我敢说几个月来我们埋头从事的极其繁重的政治工作和斗争是英勇卓绝的。我们能够完成这些工作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和加拉罕同志密切协作的结果。我们无须在议论中浪费时间，一句话就能互相理解，完全习惯于分工合作和分头处理问题。一般说来，我比较全面地担当了政治方面的工作，而他做了大量的繁琐的事务工作。他之所以能处理这些工

作，是因为他有迅速和轻而易举地掌握情况，解决问题的卓越才能，有明晰而健全的理智，并且还具有对于这个工作岗位来说极其可贵的出色的政治嗅觉。”

接触东方

1919年4月25日根据外交人民委员部委员会的决定，由加拉罕主管东方司。加拉罕熟悉东方，所以能够灵活巧妙地把列宁制定的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原则付诸实施。他以积极的态度，直接参与制订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1919年至1921年期间给东方各民族的一系列的呼吁书，藉以详尽阐述苏维埃国家的列宁主义政策。这些呼吁书中包括1919年8月发表的苏维埃政府致蒙古自治政府和人民的呼吁书；“致波斯工人和农民书”，1919年9月外交人民委员部“致土耳其工人和农民书”，以及“致朝鲜革命组织的呼吁书。”

加拉罕宣言

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就是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第一次加拉罕宣言）。(2) 宣言中这样写道：“我们使人民摆脱外国刺刀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因为他们压迫被奴役的东方各族人民，其中首先是压迫中国人民。我们不但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帮助中国人民……如果中国人民愿意象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愿意摆脱协约国在凡尔赛给中国人民所安排的命运，不成为第二个朝鲜或第二个印度，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

的斗争中，他们的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 加拉罕是这个文件的起草人之一，上面有他的签名。

宣言中清楚地反映了苏联政府积极提倡和奉行的国际关系的新原则，这是几十年来外国强国第一次主动地以平等态度向中国人民说话，并伸出了友谊之手。

帝国主义列强和北京的反动政府打算不让人民知道这个宣言，八个月以后，即1920年4月3日，这个宣言才见诸于中国报端。中国各阶层人民热烈欢迎这个宣言，并且要求立即和苏俄缔结友好条约。但是，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北京政府，没有决心与苏联缔结协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派遣了以张斯磨陆军中将为团长的军事外交使团赴莫斯科。

苏联政府为了阐明苏联的对华政策，就建立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达成协议，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使团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进行了会谈。加拉罕积极地参加了谈判活动，1920年9月27日把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备忘录（第二次加拉罕宣言）亲手交给张斯磨。苏维埃政府在这份文件中就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问题提出建议，⁽³⁾并且表明苏联政府准备和中国结成同盟。加拉罕在作为9月27日备忘录附件的一封信中，尤为精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信中表示，希望张斯磨采取一切措施⁽⁴⁾以期尽速实现基本的目标，即在两大共和国之间建立紧密的同盟。

对加拉罕宣言的反响

苏俄和中国之间缔结平等协定，尤其是结成同盟，对两

※ 《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3月版，第133—135页。

——译者

国人民具有极大的意义。它将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沉重的打击，从而促进中国的解放。这个协定既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苏俄，因为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就可能扩大苏维埃共和国的对外联系并加强苏联的国际地位。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列强所不希望的。它们唯恐结成反帝战线，把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看成是对它们推行的外交政策的一个直接挑战。唯帝国主义列强是从的北京政府虽然对苏联的提案并非无动于衷，但是在列强尚未和苏俄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

苏维埃政府的建议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作为“加拉罕宣言”载入史册。苏俄驻华全权代表团参赞达夫庆在以后就苏俄建议问题向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有一个可靠的印象，苏俄在这里确实受到尊敬，正是由于我国1919年至1921年发表了几次宣言，我们才得到中国人民的同情。”

在这以后，苏俄政府又几次尝试实现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苏俄的代表团来到北京，⁽⁵⁾中国也有外交官常驻莫斯科。但事情迄无进展，因为北京的统治者害怕违背帝国主义列强的意志。不过，苏俄的外交官却成功地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力量建立了密切关系。

1923年加拉罕赴华

1923年1月末，驻北京的苏俄外交代表团全权代表越飞因病离开中国。苏俄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把谈判地点移到莫斯科。但是中国政府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派谁到北京担负这样复杂的外交任务呢？契切林强调说：“东方问题

最复杂，也最重要，须要有具体知识，”他提议派加拉罕到北京和中国政府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加拉罕已是闻名于中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官。苏联政府派遣这样重要的人物作为谈判代表，就是要向中国人民表明苏联是多么重视和中国建立睦邻关系。

从国境线到北京的所有车站上，中国的劳动群众热烈欢迎以加拉罕为团长的苏联外交使团。使节团于9月初到达北京时，也同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欢迎群众向他们献花，向他们表示敬意。北京的学生联合会主席在欢迎词里说：“我们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唯一朋友就是苏联，同苏联友好，就能帮助中国获得民族解放和独立。”市内群众还组织了游行，游行队伍举着“承认苏维埃俄国！”“被压迫者的真正朋友苏维埃俄国万岁！”“中国与苏维埃俄国的反帝统一战线万岁！”等标语。

和孙中山的联系

加拉罕到达北京后于9月8日向正在组织南方政府的孙中山发去电报，电文对孙中山“在俄国为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正经受严酷考验的时刻所表现出的友谊”表示感谢，同时把苏联使团到中国的目的和任务告诉他。加拉罕在电文最后表示希望两国政府竭尽全力“实现在我们两民族之间建立最紧密的关系的重大课题……这种友好关系将是我们两国人民自由、和平发展的保证。”（6）

孙中山在9月16日的回电中这样写道：“我对新俄国的毫不动摇的友情得到了阁下善意的好评，使我深受感动。我断言，无论对阁下拥护的意识形态所作的任何批评，都不能妨碍

也不会妨碍我和阁下的共同看法，即两国的真正利益要求我们制定共同的政策。并且我明确地说，这个共同政策有可能使我们同其他大国在平等条件下生存下去，并使我们摆脱政治和经济的奴役，而这种奴役正是依靠强权和采取帝国主义经济方式活动的国际体系所强加于我们的。”孙中山进一步说：“他们（指北京政府——中文译者）绝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他们甚至连民族政权的外衣都不要了，他们推行的外交，与其说是根据中国切身的利害关系，不如说实际上是遵照某些外国列强的希望和指示。”因此孙中山预言⁽⁷⁾，和这样的政治集团谈判，加拉罕一定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北京政府代表王正廷在中苏会谈中建议苏联仿效美国来制定对华政策，加拉罕尖锐地批驳了他。孙中山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孙中山说：“我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向阁下表示欢迎和感谢，你们给了北京现时当权者的这个忠顺奴仆以应该记取的有政治现实意义的教训”。⁽⁸⁾

1923年9月17日孙中山给加拉罕的信中写到：“看来无须在此多说，为了推进贵使团到中国的任务的完成，在我能对你们有所帮助的意义上，阁下是可以依靠我的……”

“以不侵犯中国人民主权，把新俄国置于和外国列强同样平等的国际地位为条件，同北京政府举行谈判之际，如阁下认为这种谈判没有成功的希望，阁下可能会考虑，与其空手返回莫斯科，不如到广州来和我正在组织的新政府进行会谈更符合阁下的目的。资本主义列强正通过北京政府，并且指使北京政府企图使苏维埃俄国遭受新的外交失败。但是我一向认为，我准备而现在有可能粉碎那些贬低阁下和阁下政府的一切企图”。⁽⁹⁾

北京迎接加拉罕

中国的进步舆论主张立即和苏联缔结条约。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响导》这样写道：“承认苏联和中苏同盟是把我国人民从被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的首要条件。”⁽¹⁰⁾，北京学生联合会向所有希望中国自由独立的人们呼吁：为了让政府立即全面承认苏联，要施加我们的一切影响，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加拉罕和他的代表团成员会见了各个团体的代表们，并且发表演说以及为中国报刊撰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反对中国的阴谋，表明苏联的对华政策完全不同于帝国主义的政策。加拉罕在一个招待会上的演说里说道：再没有比访问哈尔滨时亲眼看到中国的行政当局，中国的法律以及中国行使主权更愉快的事情了。

加拉罕在1923年9月11日向外交人民委员部写的报告中汇报了到北京后的初步印象。他这样写道：“如果说一年前，只有学生、教授、国民党人以及接近他们的民族主义者是我们的支持者和朋友，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认识到，必须要同我国恢复外交关系。没有一份报纸不表示欢迎我们的到来或者不要求立即解决和我国的关系的。特别是统治集团对我国态度的变化，无论从对我的接待上或从欢迎会上所表示的态度，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欢迎会至今没有停止，大概要持续到十月中旬。为了筹备欢迎会，特地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委员会内有政府、众议院、参议院、军事当局、贸易机关、银行、教授和学生的代表。”

和北京政府的建交谈判

加拉罕向北京政府提议，要首先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以后再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但是北京政府主张，首先讨论两国关心的各种问题。

中国人民十分关切谈判的情况。最能反映中国社会舆论的莫若北京大学举行的民意测验，在问到：“谁是中国的朋友，是美国还是苏联？”这个问题时，回答是“苏联”的人要比回答是“美国”的人多四倍。问到：“谁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时，教师和学生一致地回答：是列宁。

1924年1月末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表达了对苏联深切的感激之情。由孙中山起草的大会给加拉罕的回电这样写道：“本会深信全世界之自由民族，必将予以同情，而俄国人民来此先声，尤为吾人所感激，中俄两国人民行将共同提挈，以进于自由正义之途，文谨代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致敬于邻友全俄苏维埃。※”

1924年3月初，协定草案最后拟定，苏联和中国代表进行了草签，只剩正式签署了。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签字被迫延期。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向中国外交总长表示对中苏谈判顺利进展的不满情绪。法国政府警告⁽¹¹⁾北京政府说，如果要求赔偿中东铁路的损失，“一定会大大增加中国政府的财政困难”。北京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拒绝在已取得一致的协定上签字。美国《纽约时报》在1924年3月23日得意洋洋地说：苏中谈判看来已要完全失败。

为了不使业经协商好的文件的签署工作夭折，加拉罕采

※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25日。